
上海早期党校初探^{*1}

朱华

(上海行政学院, 上海 200233)

【摘要】: 本文主要依据档案文献, 对中国共产党有关党内教育和干部培训方针的演进和上海早期党校的设立情况进行初步的梳理和考证, 认为上海早期党校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校之一, 上海早期党校所呈现的办学特点, 已经体现了党校办学的一些基本规律。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上海早期党校; 干部教育培训

【中图分类号】: D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176 (2009) 02-011- (9)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党内教育工作。通过举办党校, 对干部施行比较系统的理论教育和能力培训, 以提高其政治素质, 是党的优良传统。但是, 对于党校这一重要机构的起源及其初始形态, 党史学界尚缺乏深入的研究。本文试图通过比较可靠的档案文献, 对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校之一——中共上海区委所设立的党校的由来及其大致情况, 进行一些初步的考察, 以期抛砖引玉, 引起更多专家学者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

一、中共早期的党内教育与干部培训方针

干部教育培训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校则是从事党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专门机构。中国共产党对加强干部教育培训和举办党校必要性的认识, 是在领导革命的实践中逐步深入的。

党的干部教育的逻辑起点, 是党内教育, 即党对自己成员所进行的意识形态教育。党内教育的深入, 必然会提出干部教育培训的任务。

党的二大首次提出了必须开展党内教育的思想。《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指出: “我们既然要组成一个做革命运动的并且一个大的群众党, 我们就不能忘了两个重大的律: (一) 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二) 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凡一个革命的党, 若是缺少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 那就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够有力量去做革命的运动。”^①这也就是指出了党的建设的基本原则, 即党必须联系群众, 党必须有相应的组织建设和内部教育, 即“训练”。二大的党章并明确规定, 党的基层组织“组”即后来的支部, 其基本责任之一就是“对党员进行教育, 组为“训练党员及党员活动之基本单位, 凡党员皆必须加入”。^②

但是, 最初的党内教育并不理想。陈独秀在党的三大报告中检讨一年来工作中的主要不足, 首先就是“我们忽略了党员的

¹收稿日期: 2008-02-10

作者简介: 朱华男 (1954—) 上海行政学院教授教育长

教育工作。我们遇到的许多困难，都可以归咎于这一点。许多知识分子抱着革命感情加入了我们党，但是对我们的原则没有认识。工人表现出脱离知识分子的倾向，常常缺乏求知的欲望”。^③党内教育所存在的问题，很可能与其时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尚不完善有关。如上海的地方党组织曾一度“内部涣散，等于没有组织”。^④党费往往也不能按时收清。为了保证“组”（按即党的基层组织）的正常活动，上海地委甚至做出过“如组长一次溺职，罚洋十元”的决定。^⑤

1923年11月举行的三届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首次对党内教育问题进行专门的部署。会议通过的《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规定，党内教育的主要途径有三：一是进行党内的政治讨论；二是开展各小组内部的政治讨论、政治演讲；三是在小组内学习党章。议决案特别强调：逐段讨论研究党章，对新党员“有大益处”。议决案还明确了党内教育工作的组织体制。党中央的教育委员会（对外使用“社会科学会”的名义）负责党内教育中的答疑工作；各地方的党、团组织都必须推选一名教育委员，其主要职责就是：提供党内教育的材料，为党的基层组织指定从事政治演讲的演讲员，并每月向中央教育委员会汇报工作。^⑥

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随着革命形势的逐渐高涨，党对加强自身建设、特别是党内教育的紧迫性有了越来越清醒的认识。1924年5月召开的中央第一次扩大会议指出：“劳动运动尤其是近代产业工人运动是我们的党之根本工作，我们在国民革命运动中若忽视了这种工作，便无异于解散了我们的党”，“党的最重要的职任，便是继续不断在产业的工人里有规划地创设工会的组织”。^⑦会议强调：“必须使我们的党，不但是工人的阶级斗争的指导者，而且是工人最初觉悟时取得自己的政治训练的惟一组织”，“小组的工作除教育党员征求新党员外，还应当常常在工人群众里做宣传的工作。”^⑧而要对工人群众进行有效的“政治训练”，首先必须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培训，即开展对于培训者的培训。上海地委在给这次会议的报告中，就明确提出了培训干部的急切要求。报告称：“上海是最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地方，而工人群众又是这样庞大复杂，自然决不是少数没有经验的同志所能够做得起来的。我们希望中央能在别处多调几个有经验的同志来，或者特别训练一般同志出来做这上海工人运动，同时我们上海也须有一部分同志来学着同做，这是我们上海地方急切的要求，而且是不得不如此的要求。”^⑨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开展干部教育工作、并设立党校的问题首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会议所通过的《党内组织及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认定，“党内教育的问题非常重要”，并作出了两项重要决定：第一，“中央宣传部应当在党报上加重党内教育的工作”；第二，“要急于设立党校，养成指导人才”。^⑩据笔者所见，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关于建立党校以培养干部人才的决定。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召开。这次会议不仅在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⑪而且进一步明确了党内教育的基本途径和原则。大会通过的《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对加强党内教育和干部教育培训做出了一系列具体规定。第一，要求加强党报在党内教育中的导向作用。党报是“用以教育党员的最重要机关。今后当多登载党内关于政策和各种运动非公开的讨论文件”；第二，明确支部是党内教育的基本途径。“党的支部是我们党的基本教育机关，我们应在每次会议注意于政治报告和党的策略之解释，以及内外宣传遇有困难的讨论和报告。并且在有些支部，宣读并讲解《党报》《向导》都有必要”；第三，提出了举办党校以系统地教育党员的要求。“党中教育机关除支部具其一部分作用，另外于可能时更有设立党校有系统地教育党员、或各校临时讲演讨论会增进党员相互间对于主义的深切认识之必要。而党的中央机关亦宜注意到统一的材料之供给”。^⑫显然，四大已经明确，支部和党校都是实施党内教育的基本机关，而强调党报和中央机关的指导作用，则是明确了党内教育必须严格遵循党的政治路线的基本原则。

四大以后，湖南、上海、北京等地的党组织相继建立了一些党校。

1925年10月，中央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上海区委向中央正式提出：“希望上海区有一党校之设立，以供各支联、各支部及外埠独立支部选派人员学习，在实际革命工作中训练及造就一般各种工作之人才，极为必要而易举，藉此巩固上海的党部，扩大上海的工作。”^⑬中央采纳了上海区委的这个建议。会议通过的《宣传问题议决案》对党校问题做了专门的规定：“现时党内所有的力量，只能开办下列两种形式的党校：（一）各地委之下的普通的党校，造成群众的鼓动员。这种党校应当是工人的，毕业期限至多不过一月或一个半月。（二）区委之下的高级党校教育一班政治智识较高的同志和已经有工作经验的同志——造成能够办党的能够做成负责任的工作的人才，毕业期限不要过三个月。党校内的教育方法，应当根据国内革命运动的经验，说明共产党在许多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在党校听讲的同志，不应当与群众隔离，党校里的学生应当同时在校外工作，在同志或

同志间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使党校的学生得着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思想”。^⑭

这段文字，应该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关于党校工作的基本规范。第一，它提出了分级设置党校、分类培训干部的基本方针。即地委举办普通党校，以培养基层干部，学制为一至一个半月；区委举办高级党校，培训程度较高、并有经验的领导干部，学制为不超过三个月。第二，它规定了党校教育的主要内容，应该是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第三，它明确了学员边学习边工作的原则。上海的早期党校，就是根据中央上述一系列方针建立起来的。

二、上海早期党校的创建

党的四大以后，全国的革命形势日益高涨。尤其是五卅运动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地区的力量急剧增长。五卅运动前，上海区^⑮的党员总数为295人，在运动中增加了785人，到1925年9月，总人数已达1080人，占全党总数的三分之一；全区共有74个支部，其中65个在上海。1926年7月，党员数增至2241人，支部则有112个。

党员队伍的迅速扩大，立刻使党的建设任务的重要性凸现了出来。最尖锐问题，就是如何对新党员进行有效的教育。中共上海区委坦承：“在五卅高潮中，我们吸收八百人之多，免不了有少数的反动的不稳分子，所谓‘高潮带进的草渣’。”当时的许多新党员，不能分清党与工会的关系，甚至“不知道党是什么东西。”^⑯

根据中央的决定，上海地委于1925年8月21日正式改组为上海区委。第一次区委会议，除了确定分工、办公时间地点等日常工作外，主要就是研究党内教育、特别是支部书记的培训问题。李立三在会上提出：“新同学及各支书记都幼稚，固属危险”，建议“老同志于每周抽出一点时间任训练工作”，并通过各支部书记联合会培训书记。会议最后决定举办“师范班”，亦称“地方经常学校”，内设“训练书记班”和“各支部书记班”两种班次。^⑰几天后，区委又正式决定，以后在行文时，“党内教育”应改称为“党内训练”。^⑱

同年8月28日，上海区委会议正式通过“成立党校案”，确定党校“人数计四十人，由宣传部即速积极筹备”。^⑲9月8日，区委确定了参加党校学习的学员名单，并决定党校暂借上海大学附属中学开办。^⑳当时的上海大学及其附属中学，刚刚迁到闸北青云路师寿坊的15间民房中，于9月10日正式开学。初中部主任高尔柏，正是上海大学党支部书记。^㉑因此，上海首期党校，应该就设立在闸北青云路师寿坊。至于详细地址，因原建筑无存，已难以查考了。9月18日区委曾通知在“闸北青云路师寿坊第七弄左手第一家后门上海大学”召开各支部联合会干事联席会议，这也许就是首期党校所借的地址。

区委当年9月27日向中央提交的组织报告指出，这首期党校的培训目标，就是“造就新的训练人才”，40名学员由上海本地的各支部联合会或支部选派，其中工人党员占三分之二以上。学制为每周上两次课，共计4小时。^㉒至于具体的培训时间、课程内容，由于缺乏进一步的资料，还难以详考。但可以肯定，该校在9月份已经开学。除了组织报告的陈述外，同月21日的上海区委会议记录中，也专门提到：“师范班借地址，据报告颇多侦探注意。但另无地点，同时又不能中止放弃。决定：点名册取消。1. 每人均须手携普通书籍。2. 工人亦均须穿长衫。3. 不用记录。4. 身畔绝对不带文件。李季续讲两个国际，目下因无人担任。”

^㉓我认为，这个“师范班”，就是设在闸北上海大学的党校。因为如前所述，这个党校的目的是“造就新的训练人才”即师资，最初确曾被叫做“师范班”；学员中工人成分较多，与上述党校完全一致；而且“侦探”窥视的问题，只有在闸北等华界才存在。另外，从成文于当年10月的上海区委组织框架表中也可以看出，区委宣传部中已有专门负责“训练班、党校、工校”的职位，主持其事的工作人员，就是曾经担任中央主席团秘书的薛世纶。^㉔

此外，中共上海各部委和共青团上海地委，这一时期也办起了一些培训班。区委宣传部还制定了一个《工人同志训练班纲

要》，详细规定了教学大纲和授课方法。时任共青团曹家渡部委书记的李强回忆说，他在1925年11-12月间，曾去青云路的上海大学参加团区委（按：应为团地委）组织的干部集训，每周要上几次党课，讲课者有瞿秋白、罗亦农、李立三、彭述之等。⁹

按照前述中央第二次扩大会议的定义，上海首期党校虽然由区委举办，但性质显然属于“地方党校”，因为培训目标是造就一般的“训练人才”，即基层活动分子，学员亦以工人党员居多，且无外埠人员。所以，上海区委又在1925年10月向中央提出建立区委党校的意见。

1926年1月，上海区委决定建立区委党校。区委宣传部1月份的工作计划称：“为使党的宣传与训练工作能迅速发展，本区宜即日成立一党校，召集一班政治知识较高的同志和已经有工作经验的同志，造成能够办党及负重要责任的人才。此党校人数以三十人至四十人，每天一课，共十四课。”¹⁰2月6日的区委主席团会议决定：党校“由组织部挑选二三十人开班，教员要好点的”。¹¹随后，区委又确定，这期党校称为高级党校，并规定了8个月的学制、所开设的课程和学员名单。¹²但这期党校的实际开办时间，仍然有待查考。因为直到3月6日，区委会议才最后决定通过高尔柏租借上海大学的房子，并要求由上海大学用“其他名义”进行掩护。¹³

1926年6月，根据中央的决定，上海区委举办了第二期党校。这期党校偏重于教授实际工作方法，学员20-30人，为区委各机关、各部委及各独立支部负责人，每周上课二次，每次2小时，学制为四周。大概由于白色恐怖的原因，这期党校的上课地点不再固定。“第一次商务工会，本星期五（引按：即6月11日）上午十至十二时，以后每逢星期三、五举行。联合战线问题，顺泰里。工人运动，海员公（工）会。”¹⁴到6月底，因为敌情严重和难以找到合适的房子，党校曾被迫停课两周，直到7月14日才恢复上课。¹⁵

1926年7月底，上海区委宣传部部长尹宽向中央宣传部提交了一份书面的工作汇报，其中对上述两期区委党校的工作做了简单总结：“区委共举行过两届党校，听讲者多为各部委负责共约六十余人。”¹⁶

郑超麟在晚年的回忆中称，他对上述区委所办的党校，已毫无印象；但参加过后两期党校的授课：“一期是招收上海本地和江浙两省的基层干部，约有四五十人，校址设在辣菲德路（按：即今复兴中路）一个弄堂里，三楼三底房子，弄口和大门口挂着“启迪中学”牌子。尹宽做校长，区委宣传部秘书梁志修做庶务兼会计。那时已经同杜月笙合作了，学校受杜月笙保护，我们堂而皇之教党课。三个月结束后，房子派了其他什么用场。1927年2月间，这房子做了第二次暴动的指挥部”；“另一期则设在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按：即今山阴路）恒丰里104号三层楼房子，校长仍是尹宽，学员也是基层干部，但换了一批人，这期党校未曾结业便发生第三次暴动了，于是校舍做了暴动的联络站。……这个三层楼房子后来作区委的一个机关，常在这里召集干部会议。陈延年就是在这里被捕的。”¹⁷据上海区委宣传部的报告，“区委的党校，在九月中没有举行，因为人力的关系，同时各部的高低级训练班，举行也很少。”¹⁸但在同年10月16日即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前夕，罗亦农又在一次会议上提出：“现在枢委（按即区委）预备召集活动分子会，开办党校，以培养人才。党校分两种，一为专门培养工作人，一为各原有工作的同志。现由法部（按即法租界部）负责找房子在法租界。党校问题要待讨论。”¹⁹也许这就是郑回忆的设在法租界的党校。

在是年12月17日的区委全体会议上，办党校问题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罗亦农称：“党校非速办不可，待与中央商量”，赵世炎则提议：“党校在一个月之内成立。”²⁰区委主席团随即作出具体部署：由徐梅坤、尹宽负责寻找党校办学地点，办学器具可用景平女校的；学员为上海各部委25人，工会系统旁听的5人，外地20人，并须具有“能听高深讲演、有指挥能力”的资格；学习时间为一个半月。²¹但直到1927年1月10日，办学地点仍未落实，而报名的学员已超过了60人。区委再次做出决定，要正式举办这期党校，并将学制延长到半年，计划总课时为160小时，其中理论教学与实际工作教学各80小时。区委并决定将原准备用于运动海军的5000元经费中，提出3500元作为党校办学经费。²²据此，尽管郑超麟晚年对这一时期个人经历的回忆，并不十分可靠，时间方面尤多出入，但这段回忆，因有上述文献佐证，还是大体可信的。只是这两期党校所培训的对象，他可能正好记反了。

根据以上的粗略考察，可以看出，从1925年9月到1927年3月，中共上海区委总共举办了五期党校。首期应该称为上海地方党校，以培训党员中的工人骨干为主；后四期则是正式的区委党校。另外，上海区委和中共中央还于1926年5月举办过一期特殊党校，即“择各区失业工人同志之较有能力者入党校听讲，每月给津贴十元，两个月毕业”。⁹³

王仲清主编的《党校教育历史概述》认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校是1923年冬由刘少奇、任弼时、任岳主持的安源党校，有100多名党员参加学习；其次是中共长沙地委与共青团长沙地委合办的党校，第三是罗亦农于1925年10月第二次扩大会议后在北京办的党校。⁹⁴关于长沙和北京的党校，都有较充分的文献依据；但有关1923年冬安源党校的说法，史料依据显然还不充分，因为任弼时、任岳都是1921年赴苏俄留学、1924年才回国；而且，据1924年5月的《安源地方报告》，其时当地党员人数为60人，1923年8月仅40人。⁹⁵据笔者查考到的文献史料，直到1925年春，安源才设立了党团合办的党校。共青团安源地委宣传部1925年4月9日的报告写道：“团校是与大学合办，团校现分两班，课程每星期三课，教材是《政经浅说》、《少年史》及《大学史》，教书的人是泽楷、大石、士廉、劲光。”⁹⁶

据此，可以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中国共产党的党校事业发轫于1925年；开办于1925年9月的上海首期党校属于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校之一。

三、上海早期党校的若干办学特点

尽管就办学形态而言，上海早期党校与日后或今天的党校相比，无论在设施、规模和制度方面，都只能算是一种雏形——它们甚至没有固定的校舍和师资。而且，由于资料的匮乏，我们还无法对其详情进行更细致的考查。但即便如此，在有限的档案文献中，仍能看出它及同一时期干部教育培训的若干特点。

第一，区委领导机关高度重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对党校实行直接领导

1925年8月上海地委改组为区委，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央认为，原地委领导不够得力。⁹⁷而区委成立的当天，就把加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并很快作出了设立党校的决定。这个事实，应该能够说明，未能充分注意干部教育培训问题，是原地委工作的主要不足之一；而加强干部教育培训，正是新区委推动上海工作的首要措施。

实际上，如前所述，上海早期党校的几乎所有具体问题，如办学地点、学员名单、课程内容、教员名单甚至上课时间，均由区委会议或区委主席团会议直接讨论决定。因此，党校在师资配备、学员调训以及经费方面，都能得到有力的保障。如1926年2月16日的区委主席团会议即决定，区委党校由区委书记罗亦农、宣传部长尹宽担任教授，学员为李硕勋、余泽鸿、何成湘、刘昌群、刘荣简、郭伯和、陈比难、张永和、侯绍裘、顾谷宜、高尔柏、诸有伦、于翔青、沈雁冰、邵季昂、张晓柳、张廷灏、刘重民、陈之一、曹趾仁、张超、杨之华、钟复光、梅电龙、徐梅坤、梅中林、贺威圣、丁晓仙。⁹⁸这是一份令人印象极其深刻的名单。因为这些人全部是有较长党龄的老干部，按郑超麟的说法，其中的沈雁冰、丁晓仙、侯绍裘、张廷灏、梅电龙、顾谷宜还都是“有名的党内知识分子”。⁹⁹而实际担任这期党校授课的教员，除罗、尹外，还有王一飞、彭述之、瞿秋白、郑超麟等党内著名的领导人、理论家。¹⁰⁰

区委书记罗亦农尤其重视党校工作。他不仅亲自担任党校教员，每期承担两门以上的课程，还经常就党校工作征求意见。如第二期区委党校开班前，他曾专门征询各部委书记的意见，你们认为什么时间上课最少妨碍工作？听取意见后才决定：“上午十时至十二时。办四星期”；¹⁰¹开班后，又曾在部委书记会议上征求对于党校培训的评价：“党校大家意见如何？”得到的答复是：满意赵世炎、尹宽的报告；不满意何松林（汪寿华）的报告，因为材料不够充分。¹⁰²

同一时期，区委还一再强调各部委都要普遍举办不同类型的高级低级训练班或党校，“一方面培植工作人材，同时又普及共产主义的教育”。⁹⁴然而，由于严重缺乏教员，这一要求未能普遍落实。1926年3月，上海区委还决定在南京“办短期党校，由傅燾（按即区委）派人前去教授关于普通党的知识的培养”。⁹⁵

第二，力求教学内容切合实际工作大局，对干部实行分类施教

当时上海区委的主要领导，几乎都是知识分子，因而最初特别重视系统的理论教育。首期党校虽然是以工人党员为主，但课程中仍有“二个国际”这种纯基础理论性质的课程。第一期区委党校的课程，更是强调理论教育的系统性。最初拟开设的课程为：马克思主义概论、经济学、阶级斗争史、列宁主义、第三国际之党纲与策略、俄罗斯革命运动史、最近中国革命运动史、辩证的唯物论、中国CCP之任务、职工运动之四形式，⁹⁶几乎全部属于基础理论。后来实际开设的是：“1. 资本主义特征及其崩坏（三次）；2. 第三国际的政策（二次）；3. 共产党即无产阶级的解放（二次）；4. 帝国主义对中国侵掠之方式与中国国民革命（二次）；5. 中国劳动运动与我党之发展（一次）；6. 现时国际状况与世界革命运动之趋势（一次）；7. 目前中国各种社会阶级之倾向与吾党之策略（二次）；8. 党的组织及纪律（一次）；9. 农民问题及中国农民运动之发展（一次）；10. 目前的政局与国民革命工作（一次）。”⁹⁷属于党的方针政策解读性质的课程即7、8、9、10，约占总课时的三分之一。

然而，当时的工作实际，仍不可能允许党的领导干部占用这么多时间接受理论培训。正如区委宣传部所总结的那样，这一期党校的实际效果不够理想，因为这种课程“多为抽象的理论，与目前的政治工作隔离太远，一方面使听者不能有实际的行动的思想，另一方面不能应付目前紧张的各种斗争。”⁹⁸

据此，区委断然改变了第二期党校的课程结构，要求以讲述党的具体方针政策并结合上海工作实际为主，并强调要加强具体工作方法的讲授，如“怎样组织及如何当书记、当宣传、当组织及如何教育同志，如何深入群众等方法”。⁹⁹囿于实际讲授的课程全部属于党的方针政策解读，即：“1. 政治问题——注重实际（一次）；2. 上海联合战线（四次）；3. 国民党问题（一次）；4. 职工运动（二次）；5. 党的组织（此题因在扩大大会里报告没讲）（二次）；6. 党的宣传（二次）。”区委宣传部的汇报认为，这第二期的效果比第一期好。¹⁰⁰

同时，区委宣传部还分别规定了由各部委所主办的各种干部、党员训练班的课程，甚至课程的教学大纲。其特点是，既要求“普及共产主义的教育”，又要讲授支部、工会的具体工作方法，以“培植工作人才”，并根据培训对象确定课程体系。即使同样的基础理论课，也因对象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如：各部委的高级训练班的课程为：“1. 五卅运动之发生；2. 五卅运动与中国民族革命运动（革命势力发展、民族革命之阶级分化、民族革命之主力军）；3. 我们党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策略；4. 民族革命与世界革命；5. 帝国主义之必须崩坏；6. 党的作用、组织及纪律；7. 党的运动与工会运动；8. 支部的重要与工作；9. 当此五卅以来帝国主义者、大商阶级进攻之际我们应怎样进行我们的工作；10. 目前中国政治状况及我们党的工作。”其中，属于基础理论的课程仅1、2、4、5四种，其余均为党的方针政策。组织员训练班的课程则为：“1. 什么是共产党（钟点数二）；2. 什么叫做阶（级）斗争（钟点数二）；3. 工会与党的关系（钟点数二）；4. 工会的意义与其职能（钟点数二）；5. 组织的意义及其原则（钟点数二）；6. 怎样做宣传工作（钟点数二）；7. 怎样鼓动群众（钟点数二）；8. 怎样训练群众（钟点数四）；9. 工会的策略及其运用方法（钟点数六）；10. 罢工战术（钟点数六）；11. 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钟点数二）；12. 工会群众们（钟点数二）；13. 联合战线（钟点数二）；14. 工会运动中党的发展（钟点数二）；15. 怎样（做）一个C. P.（钟点数二）；16. 组织员的责任及其应具备之条件（钟点数二）；17. 上海工运史略（钟点数六）。”¹⁰¹其中，属于基础理论的仅1、2、15、17四种12课时，而有关具体工作方法的课程则有6、7、8、9、10、14、16七种共26课时，占总课时的一半以上。

第三，高度重视教学方法

当时，上海区委对于党员和干部培训的方法，有着非常明确的具体要求。即第一，讲授必须结合中国、上海或当地的实际；

第二，讲授时必须留出一定时间与学员互动。这也就是力求讲授通俗易懂，并注意调动学员的积极性，以获得培训的实效性。

如1925年9月《上海区委宣传部关于工人同志培训班纲要》（按：实际上是教学大纲）规定，当讲授到资本家必然互相竞争时，“应举出中国资本家与外国资本家的竞争为例”，讲授的重点和联系实际的内容，可以由讲授者自定，但“讲演者务求以当地工人生活情形阐明理论”，“每次讲演至少须留出三分之一时间作为讨论”。^①1926年1月的《上海区委支部训练班课程内容》也规定，训练员“要讲解某一点，宜就本地风光列举事实加以说明而归纳之，切忌先说抽象的原则”；“必先求熟悉当地工会发展的情形，资本家压迫情形，工贼捣乱情形，过去工人争斗的事件……等”；“每次必须留二分之一或至少三分之一的时做讨论，务使听者逐渐都得参加讨论的机会”。^②尽管这些规定均非针对区委党校，但区委党校的教学方法，也应该与此类似。回忆资料表明，罗亦农就是这样一位非常善于联系实际讲授的好教师。“曾接受过他培训的同志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罗亦农讲课眉飞色舞，手势极多，常常用一些通俗易懂、生动风趣的语言，一下子点出问题的实质。……不少同志学他的样子，对一些基层党、团、工会的骨干也进行类似的培训”。^③

由于上海早期党校完全由中共上海区委领导革命的实际需要所催生，它所具有的这些特点，即党委高度重视党校工作，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紧紧围绕党的工作大局，重视教育培训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也正是以最原始、最直接的形式反映了党校办学的一些基本规律。这对我们今天党校工作，仍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注释：

①《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1922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90页。

②《中国共产党章程》（1922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94页。

③《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上的报告》（1923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171页。

④《各委员报告》（1923年1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190页。

⑤《上海地委兼区委第五次会议记录》（1923年7月14日）。

⑥《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1923年1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207-208页。

⑦《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1924年5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185页，第189-191页。

⑧《党内组织及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1924年5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244页。

⑨《上海地方报告》（1924年5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261页。

⑩《党内组织及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1924年5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245页。

-
- ⑪见拙文《试论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基层组织建设的探索》，《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4期。
- ⑫《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1925年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75-378页。
- ⑬《上海区委组织报告》（1925年9月27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43页。
- ⑭《宣传问题议决案》（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481页。
- ⑮上海区初辖苏浙两省及上海本地，后又包括安徽省。上海区委亦称江浙区委。
- ⑯参见拙文《试论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基层组织建设的探索》，《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4期。
- ⑰《上海区委会议记录》（1925年8月21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1，第123页。
- ⑱《上海区委会议记录》（1925年8月25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1，第125页。
- ⑲《上海区委会议记录》（1925年8月28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1，第130页。
- ⑳《上海区委会议记录》（1925年9月8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1，第139页。
- ㉑王家贵、蔡锡瑶：《上海大学1922-1927年》，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46页
- ㉒《上海区委组织报告》（1925年9月27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43页。
- ㉓《上海区委会议记录》（1925年9月21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1，第174页。
- ㉔《上海区委关于组织情况统计表》（1925年10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第70-71页。
- ㉕李强：《我在上海参加共青团工作和为武装起义筹备弹药的情况》，《党史资料丛刊》总第20期。
- ㉖《上海区委宣传部关于最近工作进行计划》（1926年1月6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第97页。
- ㉗《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1926年2月5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1，第192页。
- ㉘《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1926年2月16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1，第203-204页。

-
- ②⑨ 《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1926年3月5日、3月9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1,第224页，第239页。
- ③⑩ 《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1926年6月4日、6月8日）、《江浙区委五、六月份工作报告》（1926年7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1,第207-208页，第233-234页；乙7,第307页。
- ③⑪ 《上海区委宣传部关于最近两周宣传工作的指示》（1926年7月14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第287页。
- ③⑫ 《上海区委宣传部关于沪区宣传工作的报告》（1926年7月31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第331页，第332页。
- ③⑬ 《郑超麟回忆录》（上），东方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418-419页
- ③⑭ 《上海区委宣传部关于沪区宣传工作的报告》（1926年9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第437页。
- ③⑮ 《上海区委剥开各部委书记会议记录》（1926年10月16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4,第88页。
- ③⑯ 《上海区委全体委员会议记录》（1926年12月17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7,第97页，第100页。
- ③⑰ 《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1926年12月24日）、《上海区委召开各部委书记会议记录》（1926年12月25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7,第151-152页，第165页。
- ③⑱ 《中央、上海区委联席会议记录》（1927年1月10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7,第320页。
- ③⑲ 《江浙区委五、六月份工作报告》（1926年7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7,第269页。
- ④⑩ 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33-34页。
- ④⑪ 《安源地方报告》（1924年5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270页。
- ④⑫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年，第442页。

-
- ④③ 《郑超麟回忆录》（上），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411页。
- ④④ 《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1926年2月16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1，第204页。
- ④⑤ 《郑超麟回忆录》（上），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418页。
- ④⑥ 《上海区委党校及各部委高级训练班课程表》，《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112页。编者判定此件的时间为1925年12月，误。
- ④⑦ 《上海区委召开各部部长会议记录》（1926年6月5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2，第219页。
- ④⑧ 《上海区委召开各部部长会议记录》（1926年6月26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2，第331页。
- ④⑨ 《上海区委宣传部关于沪区宣传工作的报告》（1926年7月31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第333页。
- ⑤① 《上海区委会议记录》（1926年3月16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1，第268页。
- ⑤② 《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1926年2月16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1，第203-204页。
- ⑤③ 《上海区委宣传部关于沪区宣传工作的报告》（1926年7月31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第331页。
- ⑤④ 《上海区委宣传部关于沪区宣传工作的报告》（1926年7月31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第332页。
- ⑤⑤ 《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1926年6月8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2，第223页。
- ⑤⑥ 《上海区委宣传部关于沪区宣传工作的报告》（1926年7月31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第332页。
- ⑤⑦ 《上海区委宣传部关于沪区宣传工作的报告》（1926年7月31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第332-336页。

⑤⑦ 《上海区委宣传部关于工人同志训练班纲要》（1925年9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第30-34页。

⑤⑧ 《上海区委支部训练班课程内容》（1926年1月6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118-120页。

⑤⑨ 《上海英烈传》（第3卷），百家出版社，1988年，第52-53页。